

整合理論及其對中國問題 解決的應用

吳新興

(國立成功大學政治經濟研究所副教授)

一、前言

中國大陸的政權控制由中華民國更換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已有四十餘年，然而這兩個敵對政府之間的相互敵視、鬥爭與猜疑並未隨時間消失。作者本人相信，這種情況是四十六年前的內戰以不同方式之延續，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兩者不僅為政權而戰，更為文化與合法性而戰。至目前為止，造成這些衝突的根源並未消失，也形成中國問題解決最重要的根本障礙。^①

然而自一九七九年開始，中共一系列的外交創舉，例如目的在促成與中華民國協商統一的「三通四流」（也就是所謂的和平出擊），已使得兩個中國之間的關係進入了一個新的局面。^②然而在這同時，中共不但抵制中華民國參與各種國際組織，也向中華民國威脅，如果再拒絕與其談判，就將對其使用軍事武力。但儘管中共有這些充滿敵意的行為，台海兩岸卻有了較為緩和的氣氛。

一九九〇年五月廿日，李登輝總統在其就職演說中宣示：「如果中共能夠體認世界大勢之所趨及全體中國人的普遍期盼，推行民主政治及自由經濟體制，放棄在台灣海峽使用武力，不阻撓我們在一個中國的前提下開展對外關係，則我們願以對等地位，建立雙方溝通管道，全面開放學術、文化、經貿與科技之間的交流，以奠定彼此間相互尊重、和平共榮的基礎」。李總統更強調：「期於客觀條件成熟時，依據海峽兩岸中國人的公意，研討國家統一事宜」。^③李總統的演說，確實增進了兩個中國和平統一的可能性。

顯然的，在一九七九年之後，中國問題的本質已經產生變化，兩個中國之間的關係，已由對抗走向和解。而在一九七九至一九九三年之間，兩個中國之間的往來也日益增加，如雙方的貿易額已經達到一百五十一億美金。在一九九三年，中共也成為中華民國的第四大「貿易伙伴」，僅次於美國、日本與香港。除此之外，至一九九三年

註① 作者對於「中國問題」一詞的定義，是兩個中國在將來會否整合或分離。

註② 一九七九年北京提議，兩個中國之間應該三通：通航、通郵、通商，四流：學術交流、文化交流、體育交流、科技交流。

註③ 全文請參閱中國時報，民國七十九年五月廿一日，版二。

六月底止，台灣在中國大陸有一萬五千項的投資計畫，數額也達到一百三十六億美金，使台灣成為中國大陸的第二大投資者，僅次於港九。除了經濟方面的往來之外，兩岸之間的民間接觸，也自一九八七年台北開放中國大陸探親之後，快速的增加。至一九九四年二月底止，自台灣前往中國大陸探訪者，已經超過六百萬人次，相對的，也有五萬五千人自中國大陸來到台灣。^④

本文旨在探討兩個主要問題，首先，就是兩個中國之間的和解會導致雙方在未來和平的政治統合嗎？其次，如果和平統一不是最終的結果，那是為甚麼？本文之中，作者將以國際關係中的整合理論（Integration Theory）作為分析架構，因為與其他理論相較，統合理論重視和平方式的政治統一，與一九七九年以來的兩岸關係，也就是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的和平而非強迫式的整合，較為相近之故。

二、整合理論

赫斯（Ernest B. Hass）指出，一九五〇年代地區整合研究的開始，受到兩個趨勢所影響，一是美國系統性社會科學研究的興起，另一是歐洲建立一個統一歐洲大陸的政治努力，或至少是西歐的整合。^⑤在其後，歐市就成為整合理論的實驗室。^⑥在其後，整合的研究擴及其他區域，包括非洲與拉丁美洲。研究整合理論的學者並且運用了許多不同的研究方法與技巧，特別是系統分析，學習過程的電腦模擬分析，以及決策與談判的理論。這些，都造就了許多相關的社會、經濟、政治方面的數據資料。^⑦

（一）功能主義：整合理論的起源

功能主義，以及當代的新功能主義，肇始於整合理論之前，且本身就不僅僅是一個理論而已。實際上，功能主義是一種哲學思考，基於消除國與國之間戰爭或糾紛摩擦的一種嘗試，如促進全球人類的經濟社會福利而不論國家疆界，或建立國際組織，在特定的活動或功能上滿足人們社會經濟方面的需要。^⑧功能主義主張，在政府體制與事務愈趨複雜的二十世紀，業已使得政府越來越難以有效的發揮功能，也使得國際合作更有必要與更加重要。泰勒（Paul Taylor）主張，在當代工業化國家之間，就多項福利問題之國際間合作的成功，可以逐漸降低因為追求國家目標而產生的爭戰，且可增強國際合作的精神。^⑨功能主義的基本假設，是對國家的忠誠可以轉換為國際

註④ 海峽兩岸經貿關係統計月報，台北，大陸事務委員會，民國八十三年三月，頁三、五、四七。

註⑤ Ernest B. Hass, "The Study of Regional Integration: Reflections on the Joy and Anguish of Pretheorizing,"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24; No.4, Autumn 1970, p.607.

註⑥ Joseph Frankel,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Theory and the Behavior of Stat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p.48.

註⑦ *Ibid.*, p.49.

註⑧ *Ibid.*, pp.49~50.

註⑨ Paul Taylor, "The Functionalist Approach to the Problem of International Order: A Defence," *Political Studies*, Vol.16; No.3, 1968, pp.393~410.

合作，以避免國家之間的競爭與戰爭。^⑩功能主義的大師米特蘭尼（David Mitrany）更提出「分枝」的原則，認為在國際合作的一個領域會導向國際合作的另一個領域。他特別提到，經濟的統一可以建立政治協議的基礎。^⑪功能主義的策略，是鼓勵政府從無爭議性及簡單的問題開始合作，這些合作是以和平為導向，並可以避免因輸贏而致無法進展。^⑫

（二）統合理論的演進

在米特蘭尼之後，整合理論的學者各自發展對整合的各種說法。陶意志（Karl Deutsch）對政治統合的描述，是在一個地理區域中的一群人獲得「社區意識」，以及一些機構強化到足以獲得人們對「和平演變」的長期期望的過程。^⑬普加拉（Donald Puchala）對地區整合的定義，是兩個或以上的國家融合成一個較大的國家，^⑭他強調整合是一種領土、政府、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的多面向過程。^⑮赫斯將整合定義為不同國家的政治角色將其忠誠對象、期望以及政治活動轉向一個新的中心，而此中心的機構對原先存在的國家具有管轄權，^⑯整合理論便是在關心為何不同的國家會自願放棄原有的至高主權，與其他國家合併。^⑰愛茲翁尼（Amitai Etzioni）對統合的定義是一個單位或體系在內外挑戰中維護自我的能力，^⑱在他的論述中，政治統一是一個體系下各單位增強彼此間的聯繫。^⑲奈（Joseph S. Nye）則說整合是走向一個政治社區的過程。^⑳

林柏（Leon N. Lindberg）在其有關歐市的著作之中，將整合界定為不同國家放棄其獨立制定外交與主要內政政策的希望與能力，以便聯合制定政策，或將決策交付一個較高的中心，以及政治角色將其期望與活動轉向一個新的中心的過程。^㉑在其後期的著作中，林柏將政治整合視為整個國際整合的一環，以達成國家之間的集體決

註⑩ James E. Dougherty and Robert L. Pfaltzgraff, Jr., *Contending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omprehensive Survey* (New York: Harper & Row Publishers, 1981), p.419.

註⑪ David Mitrany, *A Working Peace System* (Chicago: Quadrangle Books, 1966), p.97.

註⑫ A. J. R. Groom and Paul Taylor, "Functionalism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Groom and Taylor, eds., *Theory and Practic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unctionalism* (New York: Crane, Russak, 1975), p.2.

註⑬ Karl W. Deutsch et al., *Political Community and the North Atlantic Area*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7), p.5.

註⑭ Donald J. Puchala, *International Politics Today* (New York: Dodd & Mead, 1971), p.121.

註⑮ Donald J. Puchala, "International Transactions and Regional Integrati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24; No.4, Autumn 1970, p.740.

註⑯ Ernest B. Hass, *The Uniting of Europ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8), p.16.

註⑰ 見註⑤, p.610.

註⑱ Amitai Etzioni, *Political Unification: A Comparative Study of Leaders and Forces*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65), p.330.

註⑲ *Ibid.*, p.332.

註⑳ Joseph S. Nye, *Pan-Africanism and East African Integratio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p.84.

註㉑ Leon N. Lindberg, *The Political Dynamics of European Economic Integra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p.6.

策，^②並且在整合過程之中，國家之間以各種方式聯結在一起，共同解決問題，而不需訴諸武力。^③

根據雅各（Philip E. Jacob）與提溫（Henry Teune）的說法，政治整合可以大體上引申為在同一政治單位之中人們的社區關係，他們以不同的聯繫形成一個共同的認同。^④潘特蘭（Charles Pentland）的見解，是國際政治整合經常與國家主權降低或消除有關。^⑤卡普拉索（James A. Caporaso）與培勞斯基（Alan L. Pelowski）將政治整合界定為發展一套新的架構與功能的制度。^⑥加爾騰（Johan Galtung）則認為整合是兩個或更多的角色併成一個的過程。^⑦

這些對國際整合定義的回顧，可以看出國際整合研究使用了許多不同的定義，但也可看出這些研究都集中在國家之間的合作與整合。他們之間也有一個共通點，就是透過和平方式使一個體系集合在一起。^⑧除此之外，研究整合者都關心效忠對象自某一中心轉換到另一中心的過程，他們也都對將進行整合的單位之間的溝通問題有興趣，採取整合行動的人也瞭解到整合之共同好處與壞處。^⑨再者，陶意志、愛茲翁尼與赫斯使用系統理論去發展整合模式，而且整合的效果，有賴於參與單位在其他方面整合的能力。最後，研究整合的學者大體上都假設整合是一個多面向的現象，因此需要使用多面向多因子分析的方式加以衡量。^⑩

（三）整合：一個多面向的概念

就如同林柏所述，政治整合橫跨多重的集體決策體系，因此需要多面向多因子的描述與調查，僅對整合作部分的分析，可能對政治整合的條件、因素、現象等的瞭解過於簡單化。^⑪確實，整合理論的學者不僅對整合的定義有所不同，他們在其他方面也有差異，例如整合是一個過程或是一個成果，或我們如何去評估整合的過程。簡單

註② Leon N. Lindberg, "Political Integration as a Multidimensional Phenomenon Requiring Multivariate Measurement,"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24; No.4, Autumn, 1970, p.649.

註③ *Ibid.*

註④ Philip E. Jacob and Henry Teune, "The Integration Process: Guidelines for Analysis of the Bases of Political Community," in Philip E. Jacob and Janes V. Toscano, eds., *The Integration of Political Communities* (Philadelphia: J.B. Lippincott Co., 1964), p.4.

註⑤ Charles Pentland, *International Theory and European Integration* (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73), p.29.

註⑥ James A. Caporaso and Alan L. Pelowski, "Economic and Political Integration in Europe: A Time-Series Quasi-Experimental Analysi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65; No.2, June 1975, pp.421~422.

註⑦ Johan Galtung, "A Structural Theory of Integration,"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5; No.4, 1968, p.377.

註⑧ Fed M. Hayward, "Continuities and Discontinuities Between Studies of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Integration: Some Implica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Effort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24; No.4, Autumn 1970, p.920.

註⑨ James E. Dougherty and Robert L. Pfaltzgraff, Jr., *op.cit.*, p.424.

註⑩ *Ibid.*

註⑪ Leon N. Lindberg, "Political Integration as a Multidimensional Phenomenon Requiring Multivariate Measurement," *op.cit.*, pp. 650~651.

的說，自七〇年代開始整合理論便受到廣泛的計量研究測試，而且還仍有許多對定義、變數、指標的爭論。

赫斯曾將整合理論歸納為三個學派：聯邦主義、傳播學派和新功能主義，在本文之中，陶意志所代表的傳播學派和赫斯所代表的新功能主義學派中的一些概念，將會被運用作為分析的架構，因為這些概念對瞭解兩個中國整合的過程有助益。

(四)傳播學派

陶意志、卡布（Roger Cobb）、艾爾德（Charles Elder）、普加拉等所代表的傳播理論，利用國家間交流情況當作歐洲整合程度的一套變數。^③他們將交往的數量與頻率假設為人們之間建立相互關係的第一步驟，簡單的說，他們收集郵件、貿易、觀光、電話等資料，作為衡量和比較整合過程的指標。此一理論認為，如果承受交往的能力保持平衡，則國與國之間的交往便能形成一個較為緊密的社區。以兩個中國的情況來看，雙方之間的接觸、貿易、投資等，也可以用來評估兩者之間整合的程度。

陶意志表示，整合的主要任務，就是要維持國家之間的和平，提升這些國家的能力（如國民生產毛額），達成特定的任務，提供一個新的自我印象與認同等。^④他並且建議以四個標準來衡量地區性整合的成敗：國家之間的相互關係，國家之間的價值的相容性與實際上的共同獲得正面效果，國家間的相互反應，與在該社區中國家與政府之間共同認同與效忠。^⑤

陶意志並且提出兩個變數，作為描述「安全社區」為整合的主要目標：一、安全社區的合併，並且形成一個單一的個體，以保持和平，如同今日之美國；二、多元化的安全社區，並且維持不同政府之間的獨立，以維護社區和平為主要的整合目標，如今日的美、加與挪威、瑞典。陶意志與其同僚發現十二項社區安全的主要條件，如與政治行為相關的主要價值的相容性，一些政治單位之精英的擴大，以及行為的相互可預測性等。

陶意志認為多元化的安全社區比合併的安全社區較易建立與維持，也是建立和平的較有效方式。為了要建立一個多元化安全社區，必須滿足三個主要條件：^⑥

- 1.地區角色主要政治價值的相容性；
- 2.即將整合的單位之間的政治、經濟、社會行為的相互可預測性；

註③ 傳播學派的主要著作如下：Karl W. Deutsch, *Nationalism and Social Communication*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53)；Karl W. Deutsch et.al., *Political Community and the North Atlantic Area*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7)；Karl W. Deutsch, *The Analysi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1988)；Robert W. Cobb and Charles Elder,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 Regional and Global Study*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70)；Donald J. Puchala, "International Transactions and Regional Integrati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24; No.4, Autumn 1970, pp. 732~763; William E. Fisher, "An Analysis of the Deutsch Sociocausal Paradigm of Political Integrati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23; No.2, Spring 1969, pp.254~290.

註④ Karl W. Deutsch, *The Analysi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bid., p.271.

註⑤ Ibid., pp.271~272.

註⑥ Ibid., p.281.

3.政府間對於彼此之訊息、需要、行動等都能快速而妥切的作出反應之能力。

陶意志強調，整合過程的開始，經常是開始於一個或少數幾個主要的區域，其國力較強，經濟較為發展，並且在一些重要的方面較其他的區域較前進且較吸引人，^{③⑥}這個主要區域的政治精英經常扮演整個體系的主要領導人。而整合的過程有下列三道程序：^{③⑦}

- 1.知識分子的領導，作為整合運動的主要的倡議者；
- 2.重要政治人物的領導，並且許多利益團體加入此一運動；
- 3.群眾運動的階段，整合運動成為人們的共識。

然而陶意志認為整合的過程有如「學習過程」，整合的行動會前進與後退，有如學習的曲線。為了維持學習曲線的高度，並且達成實際的政治統一，相關的政府與精英必須向一般民眾倡議整合。例如，個人或團體必須被告知整合之後的新的或較大的權利與自由，並且能夠帶來較多的政治、社會、經濟的平等與較好的生活方式，也就是繁榮與物質生活改善的承諾。^{③⑧}

(五)新功能主義

赫斯、斯密特（Philippe C. Schmitter）、林柏和奈等學者倡議以新功能主義來分析整合，^{③⑨}這個學派強調角色的工具性動機，精英對專門化角色的適應性等。此外，新功能主義學者依賴漸進的決策過程，而非大的設計或具有目的的行為。^{④①}不同國家之間的精英，如果對整合行動有獲利的期待，將會互相聲援。

赫斯的主張與米特蘭尼的分枝原則相近，他提出「波及」的概念以解釋整合行為的加快動力，並且認為如果角色在其主觀利益的基礎上，希望能對其在新的情狀之下所學習到的教訓，這教訓通常會被通則化，^{④②}而除了在防衛、教育和外交政策之外，各國之間的目標，如關稅、競爭的規則、外勞開放、農業政策等方面，國家的權力通

註③⑥ *Ibid.*, p.275.

註③⑦ *Ibid.*, p.279.

註③⑧ *Ibid.*

註③⑨ 新功能學派的主要著作如下：Ernest B. Hass, *The Uniting of Europe*, 詳見註③⑥；Ernest B. Hass, *Beyond the Nation-State: Functionalism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4)；Philippe C. Schmitter, "Three Neo-Functional Hypotheses About International Integrati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23; No.1, Winter 1969, pp. 161~166；Joseph S. Nye, *Peace in Parts: Integration and Conflict in Regional Organization* (Boston: Little, Brown, 1971)；Leon N. Lindberg and Stuart A. Scheingold, *Europe's Would-be Policy: Patterns of Change in the European Community*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1970)；Henry R. Nau, "From Integration to Interdependence: Gains, Losses, and Continuing Gap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33; No.1, Winter 1979, pp.119~147；Ernest B. Hass, Mary Pat Williams, and Don Babai, *Scientists and World Order: The Uses of Technical Knowledge 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7)；Joseph S. Nye, "Comparative Regional Integration: Concept and Measurement,"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22; No.4, Autumn 1968, pp.855~880.

註④② 見註⑤, p.627.

註④③ 見註③⑨, p.38.

常會被削弱。^②

在赫斯的理論中，「政治領導」也是一個重要的概念，他強調整合是基於務實的考量，如對經濟獲利的期待、技術功能的改進等，這些整合的過程一定要受到政治領導者的支持。他提到：僅僅單純的在經濟方面的考量，整合過程並不能證明甚麼，整合是政府和與政治有關的組織的共同決定，除非各角色蓄意尋求傳播的改進，否則陶意志的概念無法對整合的動機與期待有任何貢獻。^③

對瞭解角色期盼的希望，解釋何以新功能主義學者強調分析與觀察整合過程中角色的觀感與行為。赫斯相信，成功整合的必要條件，是主要政治精英與政府領導者的承諾。相同的，英格哈特（Ronald Inglehart）認為強勢的政治領導是決定一個國家在政治整合中所能扮演的角色的最主要因素。

此外，新功能主義學者也提出整合的「境外化」概念。赫斯發現如果整合對一個第三者有利時，國外的因素會對整合有所助益，反之亦然。^④奈也假設，整合進行時，第三者越有可能作出反應，無論是正面或是反面的反應。^⑤

(六)同與異

赫斯指出傳播理論與新功能主義理論的同與異，在的方面，如共同相信一些很重要的獨立變數，角色的得與失，主要精英之間的語言與象徵性的溝通，精英之間的相互呼應，以及機構是否能夠負擔交往與傳播。

在異的方面，傳播理論認為各種交往的形式都具同等重要性，而新功能主義卻認為與福利有關的外交國防問題是最重要的。赫斯認為傳播理論的強處，是通則與系統特質，而新功能主義的強處，是與整合過程有關的角色緊密相連。

簡而言之，兩個學派之間異中有同，兩者都認為整合的程序將是冗長而緩慢，成功整合的條件是和平演變與自願融合，並且自簡單的議題延伸到其他，而政治精英所扮演的角色非常重要。這些概念都會被用作觀察兩個中國整合進展的指標。

然而整合理論起源於一九五〇年代的歐洲，所使用的概念與研究方法是否適用於第三世界的情況尚有疑問。^⑥奈和魯賽特（Bruce Russett）都已經將其分析架構使用在分析非西方國家的整合經驗，而赫斯對其研究方法適用在北約、北歐、歐洲經濟合作、美加關係的分析一點都不遲疑，但是對於使用在拉丁美洲、中東、東南亞的整合，就不敢宣示其有效性。^⑦的確，歐洲整合的經驗和其他地區的情況不一樣，目標也不一樣，也因此不能同日而語。

整合理論通常是數個個體第一次融合成一個新的個體，讀者們或許會對整合理論是否適用於中國問題有疑問，因為兩個中國曾經是統一的。然而因為以下的理由，整合理論確實與中國問題有關：多數分析者將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當作兩個不同

註② Ernest B. Hass, "The Uniting of Europe and the Uniting of Latin America,"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No.5, June 1967, p.324.

註③ 見註②, p.285.

註④ Philippe C. Schmitter, 見註③, p.165.

註⑤ Joseph S. Nye, *Peace in Parts*, 見註③, p.93.

註⑥ Ernest B. Hass, "The Study of Regional Integration," *Ibid.*, p.628.

註⑦ Ernest B. Hass, *The Uniting Europe*, *Ibid.*, p.xxxvi.

的實體看待，實際上，兩者已經分離超過四十年，在這期間，雙方都已經產生很大的改變，因此整合理論的一些要素可以用來妥切的瞭解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的關係。

然而因為整合理論的本質與中國問題本身是否有關仍未證實，在以上對整合理論的回顧之後，作者本人認為整合的許多定義與概念是可以用來作為瞭解中國問題的分析工具。兩個中國的情況可以簡單敘述如下：

海峽兩岸的整合，牽涉兩個中國之間的一個過程，而這兩者都有一個具有敵意的宣示，只有一個中國，只有中華民國或中華人民共和國可以在國際社會上代表整體單一的中國政府，而且其政府對於全中國人與領土具有主權與管轄權，彼此都試著說服對方轉變忠誠對象與期待，以讓兩個不同的中國政治實體能夠自願性的融合為一。以此方式，海峽兩岸可以在長期方面以和平演變的方式解決彼此的糾紛。

三、整合理論與兩個中國問題（1979～1994）

整合理論學者認為具有相同文化與歷史背景的國家較易整合，套用米勒（John Stuart Mill）的說法，民族感情的最重要因素，是早先的政治經驗，民族的歷史，共同社區的形成，共同的驕傲與羞辱，快樂與遺憾，和與過去事件的共同關連性。^④中國的情況來看，民族的認同並不是一個大問題，台灣和中國大陸的居民大多數都屬漢民族，他們認同一樣的文化經驗與歷史，雖然雙方分離已近五十年，兩個中國政府都堅信中華民族的原則，也強調民族的同質性，他們也在教育和文化活動中一再提醒人們其共同的文化根源。因此，本文作者強調，雖然兩個中國在政治的議題上互異，但是在文化同質性、中華民族情感、歷史背景、經濟利益、以及地緣政治方面的考量，都漸漸將兩個中國連結在一起。

在某種程度上，兩個中國的整合，不只是表現在雙方政府的統一政策，而且可以從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雙方自一九七九年以來交流的數量與頻率上顯示。雙方透過香港的轉口貿易額，已自一九七九年的七千七百萬美元，急速的增加到一九九三年的一百五十一億美元，增加幅度達一百九十六倍。在同一時期內，雙方在貿易方面的互賴也增加了，特別是中華民國出口貿易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市場的依賴。在一九七九年，中華民國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出口，僅占總出口額的百分之零點一三，而到了一九九三年，卻增加到百分之一六點四七。因為台灣貿易政策在安全上的考量緣故，僅選擇性開放特定原料與成品的進口，中華人民共和國對中華民國的出口仍低，僅占出口總值的百分之一點二。可以預料的，如果北京宣布放棄對台使用武力，並且停止杯葛台灣參與國際組織，台北將會修正其貿易政策。

整合理論的學者認為整合的過程是自簡單的問題開始，再擴及國家之間較困難的

註④ John Stuart Mill,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1861, reprinted in part in Alfred Zimmern, *Modern Political Doctrines*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9), p.206.

問題，也就是赫斯所謂的「波及」效應和米特蘭尼所謂的「分枝」。基本上，兩個中國是循著這個論點，發展其自一九七九年以來的關係，例如北京在一九七九年訂定「三通四流」的政策，和整合理論所述自簡單而不具爭議性問題開始的精神相符。我們可以發現在過去幾年，這個方法確實營造了海峽兩岸較為友好的政治氣氛，也導致雙方高層非官方代表在一九九三年四月在新加坡的會談（辜汪會談）。「波及」或「分枝」的效應，也確實發生在中國的個案中，雙方政治精英與人民和整合有關的態度、信念、與期盼，在交流的數量增加之後，都有可能產生，一般相信，兩個中國的關係，能夠以量變帶動質變。

當然，或許有人認為兩個中國之間的貿易增加，只不過反映了雙方對經濟利益的追求，實際上與台灣和中國大陸之間的政治整合無關。然而以中國人為主體的經濟區域（包括中國大陸、台灣、香港），曾聯合起來對抗在近年來危及先進國家的全球經濟蕭條。在經濟成長、工業擴張、出口貿易方面，這些區域之間的非正式經濟活動是全球之冠。台灣的資金、技術、生產能力，與香港的資金和企業經驗、市場、服務能力，再加上中國大陸廣大充沛的土地、資源、勞力供應，所謂的「大中華經濟圈」已經跨越了國界，而漸漸的融合成一個竹編式的架構。^④

換言之，後冷戰時期的國際政治經濟所強調的經濟發展，已經將台灣和中國大陸以共同利益結合在一起。我們不能忽略新的國際局勢對兩個中國整合過程的意義。如前所述，米特蘭尼提到經濟統一可以建立政治協議的基礎。從這個角度來看，海峽兩岸之間的經濟交流，能否導致未來兩個中國之間的政治整合，仍值得觀察與分析。無論如何，兩個中國目前的交流，已經波及政治的領域，而且在未來，只要雙方政治要角與利益團體有意願，雙方之間交流的層面、深度、頻率都會加強。

但是作者本人認為，只要兩個中國之間的社會、經濟、政治條件未達均衡，雙方之間增加溝通並不能導致海峽兩岸的政治整合。^⑤目前中國整合仍有四大障礙，首先，北京的「一國兩制」主張意圖將台北作為中國的附屬，因此無法被中華民國所接受。同樣的，台北的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或自由、民主、繁榮）的整合模式也無法被北京接受。其次，北京拒絕放棄對台使用武力，並且放棄在國際上孤立台灣，一直在觸怒居住於台灣的中國人，並引起他們對中共所提和平解決中國問題的誠意的疑慮。再者，兩個中國之間生活水準的落差，以及政治、社會、意識形態、經濟體制的差距，都阻礙整合的進行。以作者的瞭解，居住於台灣的中國人在訪問中國大陸之後，可能發現雙方差距太大，而傾向選擇長久維持現狀，或甚至選擇分離而非整合。最後，中華民國反對黨民主進步黨所帶領的台灣獨立運動，也會是中國整合問題中的一個變數。

作者在將整合理論適用於中國的個案時發現，居住於台灣的中國人關於交流的態度與行為，與中國政治整合過程並無明顯的關聯性，台灣人民關於中國政治整合的態度的評估，不僅需要以交流的數據為基礎，而且必須考量台灣人民與其政治領袖的觀

註④ Murry Weidenbaum, "Greater China: A New Economic Colossus"

註⑤ Hsin-hsing Wu, *Bridging the Strait: Taiwan, China and the Prospects of Reunification*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250.

念、期盼與政治承諾。而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觀點來看，兩個中國之間的溝通可以用來達成國家統一的目標。中共國家主席江澤民在一九九四年四月的對台工作會報中，就一再重複這個邏輯思考，並坦誠加強海峽兩岸經濟交流與合作，一方面可以改善雙方的經濟發展，在另一方面則可促進相互瞭解與共識，這些都對兩岸關係的改進與國家統一有很好的促進作用。^①

在將傳播理論適用於台海兩岸的交流時，並不能發現共識形成與政治整合和更多個人交流的單純動機之間是否有所關聯，目前台灣「大陸熱」的情況仍然很普遍。在分析台灣的中國人對交流的觀感與行為時，也無法發現台灣人民的動機是賺錢與旅行等功利理由，或對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整合有意願。交流僅僅顯示交流現象本身，但是，在一個很有限的程度上，這些交流確實可以讓我們評估整合過程的一些可能性。如果我們以一系列的意見調查作為台灣人民接受中共的指標，表一明白顯示，雖然近年來兩岸的經濟整合有所進展，但是支持「台灣獨立」，反對北京的一國兩制，反對統一論調的人數卻一直增加。^②更值得注意的，是這個趨勢，與台灣對中國大陸市場的依賴同步發展，顯然的，傳播理論無法解釋兩個中國之間這種「政治嫌惡、經濟友好」的不正常情況。

表一：對台獨議題的民意調查結果

時間	12 / 1989	12 / 1990	6 / 1991	10 / 1992	5 / 1993	4 / 1994	5 / 1994
贊成比例	8.2%	12%	12.7%	15.1%	23.7%	27%	27.3%

資料來源：台灣蓋洛普，民意調查基金會；中國時報，民國八十三年六月。

除此之外，將傳播理論引用在中國整合過程的未來時，也很難預測政府政策、政治精英的工具性動機等非交流性的因素所扮演的角色。或許新功能主義可以在檢視此一問題時，提供一個新的觀點。如果我們回顧中華民國政治領袖與政治精英對中國整合的承諾時，例如故總統蔣經國在一九八七年允許台灣與中國大陸增進交流，與民進黨反對統一，我們可以發現政治精英的態度、信念和觀感，是決定整合或分離過程中一個國家所扮演角色的最主要決定因素，這也可以解釋兩個中國「政治嫌惡、經濟友好」的不正常情況。

陶意志認為整合過程有如學習過程，整合行動會有進有退，就如同一條學習曲線。而如同陶意志的假設，中國整合的曲線和其他整合的個體的情況一樣，有上也有下。最明顯的例子就是一九八九年的北京天安門事件，在台灣的中國人對中共政府領導人的殘暴感到震驚，導致探訪中國大陸的人降低到一九八七年來的最低點，兩個中國之間的交流與溝通似乎暫時停止。同時，中華人民共和國控訴台北派遣國民黨特務參

註① 中國時報，民國八十三年四月十六日，版一。

註② 對台灣獨立運動有興趣的讀者，請參閱Hsin-hsing Wu, *Bridging the Strait*, *Ibid.*, pp.226~246.

與學生運動，是反北京的行為。^⑤北京並且逮捕十三名「國特」與一個台灣採訪中國大陸新聞的記者，作為對台灣的警告。^⑥但是以雙方領袖的談話看來，天安門事件對整合行動的影響並不很久。在一九八九年六月廿八日，北京首先表達與台北繼續接觸與交流的意願。^⑦台北在同年八月二日作出回應，表示願意在漸進與堅實的基礎上和中共繼續進行交流。^⑧這個例子顯示中國整合是一個學習的過程，整合的曲線是一個有升有降的情況。兩個中國如果認為整合是一種互利行為，他們將會繼續對彼此的訊息、需要、行動等作出謹慎而適切的回應。

如同林柏所說的，政治整合的研究涵蓋許多集體決策的多重層面，所以需要以多面向多因子的方法加以描述與分析，對整合內涵的單純描述，將對各種條件、因素、現象等問題過於簡單化。同樣的，兩個中國問題的解決是一個多面向的現象，必須作長期多面向的衡量與分析。事實上，中國整合的問題包含雙方政經制度與意識形態等多重領域的分析。在回顧北京自一九七九年以來的對台統一政策時可以發現，中共對於台灣與中國大陸的政治整合的條件、因素、現象等都過於簡單化，僅僅描述了兩個中國問題的部分內涵，如民族主義、愛國主義、共同傳統、家庭團聚、經濟利益等，而忽略了雙方分離近五十年來所造成的社會、經濟、政治制度的差異。

除此之外，兩個中國政府之間，對於中國問題解決的主要概念問題和時機、模式等，都沒有共識，顯示出兩者在想法上的鴻溝。在某些程度上，北京的領導人似乎相信中國問題是國共兩者之間的問題，因此可以簡單的透過雙方領導人加以解決，在會面時的一個微笑，便可以化解千仇萬恨，而無須考慮到其他相關的因素和條件。而台北的領導人則從較寬的層面來考慮兩個中國的問題，他們認為這牽涉到中國在政治、經濟、意識形態、人權方面的現代化。從台北的角度來看，中國問題在雙方領導人和精英之間的相互認知產生重大轉變之前，兩個中國的問題並無法真正解決。^⑨

四、結 論

本文簡單的回顧了整合理論，並且發現傳播學派和新功能主義之間的一些共同點。第一，雖然赫斯認為精英忠誠對象的轉變會比一般人們建立社區關係的速度快，但兩者都相信合併的程序是一種慢而長的過程。第二，他們都同意成功整合的條件，是和平演變和自願融合。第三，他們所描繪的機制都是漸進而且具有擴散性，自簡單問題的接觸開始波及其他較複雜的問題。第四，他們都認為整合過程中精英和群眾會漸

註⑤ 人民日報（海外版），一九八九年六月廿三日，版一～二；六月廿四日，版一。

註⑥ 人民日報（海外版），一九八九年七月七日，版一。

註⑦ 人民日報（海外版），一九八九年六月廿九日，版一。

註⑧ 中央日報（國際版），民國七十八年八月四日，版二。

註⑨ Shuhua Chang, *Communications and China's National Integration: An Analysis of People's Daily and Central Daily News on the China Reunification Issue* (Baltimore, Maryland: Occasional Papers/Reprints Series in Contemporary Asian Studies, School of Law, University of Maryland, 5, 1986), p.109.

漸對其在社區接觸中的信仰和態度重新定位，而不是有共識和同質性在先。第五，他們都強調精英在融合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因為倡議融合的是精英，而不是群眾。^⑤第六，他們都認為能夠負擔交流與溝通的適切機構是必要的。這些原則都用來作為測試整合理論對兩個中國問題的適用性。

在未來關於以下的問題，我們仍然可以使用新功能主義理論加以研究分析：在後鄧小平時期，中共領導人會不會改變目前的台灣政策？一九九六年台灣總統民選完成之後，台灣的領導人或居住於台灣的中國人會不會選擇與中共分離，並且公開宣稱台灣獨立？如果台灣宣布脫離中國，北京會有何種反應？如果台灣未宣布脫離中國，北京會不會接受台灣在國際社會上與中國有平等地位的要求？海峽兩岸年輕一代對於兩個中國問題的態度如何？與他們的父母對此問題的認知有所不同嗎？

此外，傳播學派的交流說對中國整合的程度也是一項很有用的指標，目前雙方的交流會不會很快的「波及」到政治的領域？如果會的話，是需要甚麼條件？在交流的數量頻率達到何種程度時「波及」才會發生？在未來的研究之中，國際局勢和軍事層面的問題也絕不能忽視。以上所提這些問題的答案，對於解決中國問題，將會有很大的助益。

*

*

*

註^⑤ Donald J. Puchala, "Integration and Disintegration in Franco-German Relations, 1954~1965,"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24; No.2, Spring 1970, p.220.